

新道德的建设必须大胆借鉴儒家道德遗产

黄 钊

为了有效地推进新道德的建设，我们必须大胆借鉴儒家道德。儒家道德是我国传统道德的主干，曾对我们民族的道德生活实践产生过无比深远的影响，其中有许多优秀成果长存不衰，即使到了现在，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。儒家道德，作为封建时代的道德遗产，之所以在当今还有价值，一是它作为优秀道德成果，具有超历史、超地域的特征；二是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心理情感和伦理意识，潜藏于我们“民族心”的深处，因而具有极大的稳固性、适应性，可以相传不绝。

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任务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。当前，社会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不合道德的现象再一次告诉人们，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建设刻不容缓。经济体制转轨以后，党中央一再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齐抓，两手都要硬。这是十分正确的。不抓精神文明建设，不完善社会主义新道德，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保证。新道德的建设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辩证过程，它既要求我们对当代人的道德实践进行合理总结，又要求我们对外域优秀道德广纳博采，还要求我们大胆继承和借鉴祖先留给我们的道德遗产，特别是儒家的道德遗产。

儒家道德遗产是我国传统道德遗产的主干，曾对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的道德生活实践产生过无比深远的影响，是世界优秀道德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今天，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，首先应当大力发掘儒家道德遗产，使它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放出新的光彩。

新道德的建设应当借鉴儒家道德，这本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。但是，由于长期以来“左”的思想干扰，“孔孟之道”被人视为封建“糟粕”多次加以“横扫”，直到今天阴影未散，因而对于能否借鉴儒家道德，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。近来，有人著文认为，儒家道德是农业社会的产物，它不可能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，不可能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产生积极作用。笔者认为，这个看法是片面的，它只看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、社会意识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存在等方面，而忽视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这一方面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，一定的社会意识在它原来所服务的社会存在消失之后，它还可能继续保存下来，被吸收进入新的思想体系，服务于新的社会存在，特别是道德领域的优秀成果更是如此。儒家道德作为世

界优秀道德的组成部分，它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，而且在当今新道德建设中仍有其重要的现实价值。这表现在：

第一，儒家的“公忠观”有助于推动社会成员增强社会责任感的道德意识。我们知道，儒家重视“忠”，孔子曾提出“主忠信”，朱熹解释曰：“人不忠信，则事皆无实，为恶则易，为善则难，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。”^①可见“忠”德多么重要。儒家又提出“天下为公”的命题，《礼记·礼运篇》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……是谓大同。”“天下为公”，贵在一个“公”字，其旨意在于提倡以公德战胜私欲，强调人们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民族的义务。把“公”与“忠”结合起来，就形成了儒家的“公忠”原则，其基本含义，就是提倡自觉为整体利益而献身的精神，这是我们民族的“民族魂”，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产生过十分积极的作用，培育了一代代爱国主义志士。从贾谊的“国耳（而）忘家，公耳（而）忘私”^②，到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；从岳飞的“精忠报国”，到顾炎武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都是中华民族“公忠”原则的千古绝唱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，永远继承。

今天，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道德，十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，提倡忠于祖国、忠于人民、忠于社会主义事业，把集体利益至上视为天经地义，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、“做人民的公仆”成了各级干部必须遵循的准则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同儒家的“公忠”思想相一致。因此，新道德的建设，应当大胆借鉴儒家的“公忠”思想，以培养人们为整体而献身的民族精神。有了这种精神，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就会更强，人民的精神风貌会更加振奋。

第二，儒家的“义利观”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义利关系方面作出正确的道德取向。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，儒家提倡“见利思义”。孔子说：“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所谓见利思义，就是主张以义制利，对于迎面而来的物质利益，合乎义则取，不合乎义则不取。孔子曾说：“富与贵，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，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^③孟子也说：“非其道，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；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。”^④“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，万钟于我何加焉！”^⑤这都集中表现了儒家“见利思义”的原则。

“见利思义”作为一种道德原则，表达了儒家在义与利关系上的价值取向，它告诉人们，对于“利”，要有一种理性的约制，不苟取，不妄得，不受不义之财。这种道德意识，毫无疑问有它的进步性、合理性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仍未丧失其应有的光辉。

今天，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虽然，市场经济应当重视经济效益，允许经营者在市场上追逐大利，允许通过市场竞争扩展自己的企业。但是，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搞市场经营，又不能不顾及社会主义祖国的根本利益，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全民族的大利。另外，在日常交往中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，我们也不能“一切向钱看”，不能拜倒在金钱面前。因为在社会生活中，有比金钱更贵重的东西，那就是正义、真情和许许多多崇高的道德原则。坚持以义制利，我们就能理智地处理金钱与道德的关系，就能把人们的真情与正义焕发出来，就能把人与人之间的纯情引向崇高的境界。

第三，儒家的“刚健观”有助于推动社会成员增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。我们知道，儒家重视刚健有为，自强不息。《易传》曰：“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应乎天而时行，是以元亨”^⑥，

“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”^⑧，“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”^⑨，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^⑩，这些都集中表达了儒家积极进取、永不停息的刚健意识。儒家先哲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道德信条，从孔子“发奋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^⑪，到孟子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^⑫，都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。“自强不息”的道德意识，过去是我们民族战胜自然灾害、抗御外敌侵略的力量源泉，今后仍将是我国人民开拓进取、振兴中华的精神支柱。正如毛泽东所说，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，积极进取、刚健有为的精神状态，可以推动我们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，不断创造人类奇迹。当前，随着改革的深入，各方面竞争激烈，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失败。这就尤其需要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，不断增强人们的进取意识。因此，儒家的刚健有为之德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完全可以派上用场。我们应当大胆借鉴，用它来激发我国人民的进取精神，鼓励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知难而进，迎难而上，开拓新局，创造伟业，满怀豪情地迈向21世纪。

第四，儒家的“中和观”有助于推进社会成员尚中贵和的道德自觉。儒家既尚中，又贵和。“中”，指适中，持中，实行“中道”，要求人们办事和处理各种问题既不“过”，也不“不及”，即恰到好处。“和”，指协和、调和、和睦、平衡等社会的与自然的统一状态。儒家的中和观念源远流长。关于“中”，《周易·大传》多次将“刚健中正”作为美德予以赞颂；孔子更明确主张“执两用中”，《论语·子罕》引：“子曰：‘有鄙夫问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’”。《礼记·中庸》也引了孔子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的话。关于“和”，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了“和乐如一”^⑬的命题，以后孔子又提出“和为贵”的观念，孟子更明确主张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^⑭，把“人和”作为处事和成就大业最理想的客观环境来追求。《中庸》把“中”与“和”连贯起来，称之为“中和”，予以评价说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明确把“中”视为“大本”，将“和”看作“达道”，认为能达到中和的境界，则天地各得其位，万物皆能发育生长，一切都合乎自然法则。可见中和之德多么重要。“中”与“和”相辅相成。“中”是“和”的前题，“和”是“中”的归宿。只有办事持中，才能深得人心，实现“和乐如一”。“尚中贵和”作为传统美德，到了今天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。实践证明，在一定条件下，坚持中和的原则，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，反之，则使社会陷入倒退和动乱。我们都还记忆犹新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林彪江青一伙搞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说什么“阶级斗争的弦松一松，阶级敌人就攻一攻；阶级斗争的弦紧一紧，阶级敌人就隐一隐”，结果制造和挑起人民内部矛盾和斗争，导致全国大乱，使国民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。“文革”以后，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理论上正本清源，肃清“左”的流毒和影响，坚持平反冤假错案，使全国出现了人心和、民意顺的政治局面，因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，说明“和”有利于社会发展。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深入，两个文明建设正在加快步伐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社会的稳定、民族的团结、干群的合作均显得无比重要。而要实现这种“和乐如一”的政治局面，就必须使全体国民对“尚中贵和”的美德予以认同，自觉地谋求人际关系的和谐、协调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为社会的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第五，儒家的“仁爱观”有助于推进社会成员树立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的道德情操。我们知道，儒家提倡“仁者爱人”。这一思想先由孔子提出，《论语·颜渊》载：“樊迟问仁，子曰‘爱仁’”。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，明确提出“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”^⑮所谓“爱人”，就

是主张关心爱护他人，具体说来，就是“推己及人”。孔子所谓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^⑧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^⑨；孟子所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^⑩等，都是儒家“爱人”思想的具体表述。它体现了我们祖先在人道主义方面所作的道德思考，对我们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。我们民族的尊长爱幼、热情好客、成人之美、济困扶危、风雨同舟等优良美德的代代相传，都同儒家的“仁爱”思想不可分割。儒家的“仁爱观”，同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同志间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的精神是相通的，因而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也有其自身价值。因为，我们所搞的市场经济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它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，这为我们推行互爱的道德规范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儒家的“仁爱”思想只有到了今天才能更好地得到继承和发扬。而要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仁爱思想，首先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，使全社会的人们真正懂得仁爱的价值。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。因为长期以来，由于“爱”被看成同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相对立的东西，因而一些人未能受到应有的关于“仁爱”道德的教育。其实，提倡互爱同马克思主义并未有什么矛盾，相反，二者完全可以互通。我们知道，马克思主张解放全人类，这恰恰是对人类的“爱”。我们只有树立“爱”的道德观念，才会有奉献精神，才会为解放全人类作出贡献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一些人践踏“互爱”的道德信仰，他们以邻为壑，以友为敌，只讲赚钱，不顾情义，因而坑蒙拐骗，无所不为，缺乏做人应有的品格。可见，当前进行“仁爱”的教育迫在眉睫。假如经营者都树立了儒家的“仁爱观”，真正做到自己想建立的，也帮助别人建立；自己想达到的目标，也帮助别人去达到；自己不希望、不要求的东西，也不强加给别人，那么市场上生产和销售伪劣商品、出卖假酒假药以及欺行霸市、短斤少两等坑人害人的丑恶行为就会得到根治。因为那些行为都不符合“仁爱”的道德原则。可见，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儒家的“仁爱观”不但没有过时，而且还将大有用武之地，我们应当对它大胆借鉴，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。

关于儒家优秀道德成果的现实价值，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来证明。如儒家的“敬业乐群”^⑪精神、“居安思危”^⑫观念、“大丈夫”式的理想人格等等，在当今都可以再显光彩。由于篇幅所限，在此就不一一剖析。以上五个方面的论述，已雄辩地告诉我们：儒家优秀道德成果在当今道德建设中有其客观价值，我们应当大加发掘，大胆借鉴，努力弘扬。

为什么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，到了社会文明发展的今天，还有其自身的价值呢？这是由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的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李瑞环同志作过深刻论述。他指出：“马克思主义还历来认为，文化遗产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共同成果，这就决定了若干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。也就是说，不但物质文明，而且包括精神文明的许多方面，不是某一个阶级所独有的，而是通过不同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，共同创造的成果。它也不是只为某一个阶级服务，而是一视同仁地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所服务。因此，我们既要看到历史文化遗产的阶级性，又要重视它的继承性和借鉴性。”^⑬李瑞环同志的这段论述，揭示了若干文化遗产具有超历史、超地域的特征。按照这一理论，儒家若干优秀道德成果，也应当具有超历史、超地域的特征。因此，它能够长存不衰，相传不绝。它和许多优秀道德成果一样，总是能够唤起人们过理智和谐的道德生活，总是能够激励人们走向社会进步、拓宽社会文明，总是能够启迪人们按照理性的原则，去处理协调各方面的人际关系。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揭示儒家

优秀道德成果在当今新道德建设中的现实价值,正好说明了这一点。

另外,儒家优秀道德能够长存不衰,也与它所包容的民族精神不可分割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,任何文化成果,都是民族群体在长期共同劳动、生活中创造出来的,都有其民族根基。就道德而言,任何道德,总是一定民族的道德,总是打上民族精神的烙印。它和自己赖以依存的民族,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,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民族的心理情感,反映了它所代表的民族的伦理特色。儒家道德正好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和伦理特色,它和中华民族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。历史上曾有人激烈地扫荡“孔孟之道”,但孔孟之道仍然潜藏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之中。今天,即使我们再次宣布抛弃儒家道德,但实际上儒家道德在我们民族中的心理烙印是无法抛弃的,它必然继续以种种形式在“民族心”的最深处潜藏着,并寻找机会表现出来。儒家道德所具有的这种民族性,是它长存不衰的又一重要原因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我们强调儒家道德同中华民族的紧密关系,这决不是说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都天生具有儒家道德意识,而是强调儒家道德对我们民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,可以长期对我们民族发挥作用。而要真正继承和发扬儒家道德的优秀成果,还必须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大加宣传,还必须各方面积极配合,创造条件,求得全体成员对儒家优秀道德的一致认同。

儒家道德早已随着儒学走出国门,已在东南亚文化圈中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。日本以及东南亚“四小龙”(南韩、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)经济迅速腾飞,都同借鉴儒家道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这说明,儒家道德遗产对于工业社会也是管用的,因而已经受到西方有识之士的关注。我们深信,随着世界优秀文化的互相交流,儒家文化必将在西方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产生积极影响。世界文化的结构正在改变,如果说,近现代以来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西学东渐;那么,21世纪的世界文化发展将会出现东学西渐这一新的趋势。我们深信儒家道德将会成为世界优秀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,为全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注 释:

① 朱熹:《四书集注·〈论语·学而〉注》

② 贾谊:《治安策》,载《汉书·贾谊传》。

③ 《论语·宪问》

④ 《论语·里仁》

⑤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

⑥ 《孟子·告子上》

⑦ 《周易·大有卦·彖传》

⑧ 《周易·大畜卦·彖传》

⑨ 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传》

⑩ 《周易·乾卦·象传》

⑪ 《论语·论而》

⑫ 《孟子·告子下》

⑬ 《国语·郑语》

⑭ 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

⑮ 《孟子·离娄下》

⑯ 《论语·雍也》

⑰ 《论语·颜渊》

⑱ 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

⑲ 《礼记·学记篇》

⑳ 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

㉑ 《重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研究》,载《光明日报》1990年6月3日。